

育人宗师 学术巨擘

——记中国逻辑史学科开创者温公颀先生

田立刚



温公颀先生论著(主编)代表作



20世纪80年代初,静谧幽雅、风景如画的南开大学校园里,人们在马蹄湖和南开湖边,常能见到一位老先生迈着缓慢而稳健的步伐在散步。他穿过湖边梧桐掩映的弯曲小路,走在大中路上,走在南开新建不久的一片教授楼间。他就是我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时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和南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温公颀教授。

认识温先生是在1978年初春,我们南开七七级学生入学的时候。在哲学系迎新会上,时任哲学系主任、年过七旬的温先生,用响亮的嗓音和充满哲理的话语,给我们上了走进南开哲学系的第一课。那时,我们知道了温先生是南开哲学系复建的主持者,是当时哲学系年龄最长的且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但他是那样的谦逊、温和、平易近人。

1981年国庆节前,班上同学到老教授家中帮助打扫卫生,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温先生的家中。先生家里的摆设非常简朴,书架和一些家具甚至是从学校后勤部门借用的。在我们忙着扫地、擦玻璃时,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跑前跑后为大家斟茶倒水。我们借着这么近距离接触当时哲学系仅有的一位老先生的机会,不停地问这问那,先生热情地一一做着解答,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那样的笑声,在以后跟随先生求学的日子里我时常能听到,清朗透明,发自肺腑,自然得没有丝毫修饰,甚至带着一种童真,从你中想象不到老人一生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只有宽厚的慈善仁爱之心和无限的真诚。

在以后的日子里,因为温先生的三个

儿子都在外地高校任教,平时只有先生和师母在家,我们便常去先生家拜访,了解到他的身世和学术经历。

温公颀先生1904年11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万安乡好坑村一个农民家庭,这里地处闽西崇山峻岭中,家中祖父辈务农没有文化,他靠宗祠的资助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1922年夏,他得到龙岩县政府的一笔就学补贴,1933年受聘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道德学”课程。1935年前后,他参加了由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哲学教授组成的“中国哲学学会”,与学会秘书长贺麟先生一起负责学会的具体组织工作,其间他多次参加了由胡适、方东美、宗白华、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等著名学者出席的哲学讨论会。在多年讲授“哲学概论”和“道德学”的基础上,温先生精心整理修改课程讲义,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哲学概论》和《道德学》两部著作,被列为当时的“大学丛书”。此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温先生还在北京多所院校讲授过“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写成四十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但因书稿散佚未能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温先生还从事逻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逻辑学》和《类比推理在实践中的运用》两部著作。

1959年,温公颀先生奉

命调回南开大学,负责组织

和领导南开哲学系的重建工作。1919年南开大学建立之时就没有哲学系,但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撤并了。温先生带领一批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调来的青年教师,为南开哲学系的重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于1962年重新成立了南开大学哲学系。今天,由哲学系发展而来的南开大学哲学系已成为国内哲学人才培养的基地,设有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培养体系,哲学系在“985”“211”高校中名列前茅。回顾这段历史,哲学系系主任陈晏清教授曾深情地回忆说,现在的南开哲学系“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桃李满园,可是这个地方的永远不要忘记这里曾经是一块荒地,永远不能忘记这个荒地的拓荒者,是温公颀先生带领的一支队伍,他是我们南开哲学系重建的带头人。这就是到现在南开哲学系几代学人都在深深怀念温公颀先生的根本原因”。

1982年,我有幸成为温先生的研究生,跟随他攻读中国逻辑史方向的硕士学位。1986年又和付永庆学兄一起考取了温先生的博士生。当时学校食堂的餐食还比较简单,饭菜也远不如现在丰富。温先生得知这种情况后,几乎每周都要把我们叫到家中,或者在听他讲课之后,请我们吃饭。每到这时,温师母就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那几年里,我记不清在先生家吃过多少次饭,只是觉得先生不仅把我们当成他的学生,而且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关怀备至,照顾有加。比起生活上的关心,印象更深的是温先生在学习和学术研究上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专业课学习每讲一部分内容都要我们写一份论文样式的作业;指导学位论文更是一丝不苟。为了指导我们学习研究,他特意写了《治学三要》一文,强调“为学贵有创见,贵得要旨,贵查原著”。温先生一共为

国家培养了七位中国逻辑史研究方向的博士,除一位到政府机关工作外,其余六位都一直坚守在高校逻辑学教学研究岗位上,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大致算起来,温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已逾数百人,在历年召开的全国逻辑学学术研讨会上,有南开传承的学者人数众多,历次中国逻辑学学术会议更是参会人数过半。可以说,在温先生的主持下,南开大学同时成为逻辑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特别是在中国逻辑史领域形成了南开大学的优势和特色。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培育教授评价道:“如今南开大学哲学系成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镇,温老有不可磨灭之功。”

20世纪80年代起,温先生负责主持国家“中国逻辑史”项目的研究工作,在科研助手崔清田教授的协助下,他撰写出版了《先秦逻辑史》(1983)、《中国中古逻辑史》(1989)和《中国近古逻辑史》(1993)三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主持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中国逻辑史教程》(1988),该书获得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了一部包含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内容的《逻辑学基础教程》(1987)。他还发表了大量哲学、逻辑学和中国逻辑史研究方向的论文。在80岁以后的十余年里,温先生不顾身患严重眼疾,不畏寒暑艰辛,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气,写下了近百万字的著作,为中国逻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事业的开拓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国家人才培养和学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1993年11月,在庆祝温公颀先生执教65周年暨90华诞之际,中国逻辑学会发来贺信,信中写道:“敬爱的温老,您不顾自己年迈和繁重的教学任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您一直在孜孜不倦、从不间断地从事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终于完成了《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中国近古逻辑史》三大卷论著,不仅为当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为推动今后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建树了丰碑。”“您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堪称是我们中国逻辑学界的楷模”。

1996年1月22日,温公颀先生因病在天津溘然长逝,享年93岁。高山仰止,思念永恒,作为温先生的学生,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温公颀(1904—1996),原名温寿铤,福建龙岩人,当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教授。1959年调入南开大学,主持哲学系重建工作。1962年哲学系重建后,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20世纪后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热潮形成与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重要理论贡献。在长期从事哲学、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学研究的基础上,晚年专注于中国逻辑史研究,1983年到1993年间撰写出版了《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中国近古逻辑史》三部重要的中国逻辑史专著,主持编写了《中国逻辑史教程》一书,获得国家高等教育优秀教材奖。

系等,标明他的创作和治学理念。他提出“欧风汉骨,东学西行”的观点,融中西艺术,主张“扬我国风,励我民魂”,力求体现民族传统和气质。同时又要“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在艺术创作中注入自我的个性和情感,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符号,为现代文人画开辟了新的路径。在充分发挥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善于吸收西洋画的色调变化。

其《王学仲书法论集》自序中说:“我历年的书法理论创作,自认是面向于开展的,虽然这样,我也很尊重别人对书法道路的选择。1993年的五四青年节,我突发头风,左肢偏枯,养病于蜗居,得有闲暇,遂把发表过的旧作理为一集,公之于世。”王先生在《书法举要:中国书法的基础理论与技法》中,对真、草、篆、隶各种书体的技法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总结了一系列的规律,同时结合一些古代玄妙艰深的书法理论,用浅显的文字阐明。其《中国书画谱:中国书画的基础理论与技法》重点整理了中国山水画的各各种画法、衣纹的十八描、苔点和夹叶、各家画树法,按中国画的逻辑体系阐明了中国画所涉及的画理和技法;同时,将有关中国画的各家名言和专用术语对照相应的国画作品,用浅显的语言加以讲解。这些著述无不贯穿了王学仲先生深邃的美学思想,也渗透了他“求我时尚,写我怀抱”、注入自我个性和情感的艺术创作理念。

对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读者来说,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新武侠小说“四大天王”之大名,可说是如雷贯耳。这四位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无疑是执牛耳者,系大家中的大家,宗师中的宗师。

今年3月10日是金庸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在这重要的时间节点,金庸的故乡嘉兴海宁策划、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文化交流活动,引起世界各地金庸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其中,让人大感兴趣的是金庸故居于3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

我,一个金庸小说的忠实读者,因受邀参加活动,得以在3月13日上午作为较早的参观者之一进入故居,先睹为快,兴奋的同时也倍感荣幸。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故居位于袁花镇赫山房,这里是其出生地,也是查家的根脉地。要了解金庸,研究金庸,理解和评析金庸的小说,袁花镇不能不去,金庸故居不能不去。这里是金庸人生的起点,有他童年的踪迹、学生时代的回忆,有查氏家族的诸多信息。

据说在南北朝时,镇上大户江州长史戚宽的宅院有花园,人称之为园花镇,后人为书写方便,把繁体字园的方框舍弃,改为袁花,从而得名,故素有“花园之镇”的美名。可见这一带在南北朝时就有官宦人家居住,花香四溢,是块风水宝地。但真正建镇则在清雍正六年(1728),距今有近300年历史。

金庸原本姓查,查家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在清代有“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的美誉。也就是说,金庸的祖上曾经辉煌过、风光过,他的家族历来是一等一的读书人家,书香四溢,也善于经商,遂成殷实富户。由此可见,金庸的成就就是有家族的文化积累、文化熏陶的,与良好、健康的家教家风不无关系。

金庸故居沿河而建,花溪水静静流过,花溪桥默默横跨,远处的绿树与金黄色的油菜花弥漫春天的气息,散发出江南水乡特有的韵味。来到此地,聆听着吴侬软语,感受到侠义剑气,领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体会侠胆柔肠故乡情。

临近了,临近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白墙黛瓦,典型的江南建筑。江浙的民居门头都不怎么醒目,讲究的是进深,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与北方有权有钱人家注重大门的豪华、气派有所不同。金庸故居的门口右侧白墙上冯其庸题写的“金庸故居”四个字,不大,不张扬,内敛、稳重。进得大门,有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原主席鲍贤伦题写的“金庸故居”匾额,字体古朴而苍劲,金石篆刻韵味浓郁。左右两侧木梁上挂有“文魁”“进士”的木匾,香气气息扑面而来。

金庸故居总面积1598平方米,分为“居”和“展”两部分。先看“居”的部分,其中涵芬草庐是金庸的出生处,雕花的老式红木架子床还在,雕刻与细雕镶嵌还挺考究,只是不确定是否为金庸出生的床榻?也许,他的第一次啼哭与普通婴儿并无不同,儿时的淘气与普通孩子也相差无几,但人生的阅历、普通的历练,成长的道路与众不同,读书的理念、未来的志向、奋斗的目标独树一帜,也就成就了他。

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着:金庸的母亲徐禄是诗人徐志摩的堂姑,而徐志摩则是金庸的表哥。名人往往以家族为单元涌现,又是一个佐证。“退思轩”是金庸祖父查文清的书室,令人联想起江苏吴江的著名景点退思园,查文清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晚年字退思,是寓意归隐呢,还是反省自己,或者兼而有之?“瀚澄堂”是康熙皇帝为金庸祖先查昇题写的堂名,匾额四周有九条金龙,抱柱楹联赫然写着“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据说就是康熙皇帝的赞誉。另一副对联气势博大,豪气干云,上联“倾东海为酒”,下联“凿昆仑作庐”。在中国能配得上,或者说敢于挂这样楹联的家族估计寥寥可数,凤毛麟角。故居还有“三益轩”《海昌查氏诗抄》木刻雕版藏室等,整座建筑实在、实用,不奢靡,不显摆。

故居的天井内有桂花树、罗汉松、无花果、垂槐、天竺、木香、蔷薇、竹子、棕竹、水菖蒲、金钱草等树木植物,平添了绿意与花香,透露出生机和生气。金庸故居是依据金庸和家人回忆中的查家老屋赫山房原貌修复、扩建的。冯其庸题写匾额,查氏族人、作家查杰撰写了文采斐然的《赫山房记》,值得一读,有助于了解金庸故居的前世今生。读《赫山房记》可知:老屋初建于明末,清嘉庆年间,金庸的一位先祖查人杰(号赫山)重建宅院后命名为赫山房。赫,通常指显耀、显盛、盛大,引申为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山,无非指踏实、稳重、出众、威严之义。赫山房好堂号,有气势有内涵。

故居“展”的部分辟有“文心侠骨赤子情”金庸故事展厅,中央文史研究院馆员、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撰写了展览序言《一篇一剑平生志,为国为民真大侠》。这个展览被认为是一个知人论世、寻根溯源、廓清迷雾的权威展示,有金庸小说早期的珍贵版本,连载报纸原件、社论时评、手稿题词、各时期照片,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资料,以及金庸用过的文房四宝、印章、眼镜等三百多件物品,不少资料、实物系第一次公开展示,其珍贵性也就不言而喻。睹物思人,令观者感慨万千。

流连赫山房,伫立在金庸遗物前,我仿佛看到他天马行空构思着“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箫”;仿佛看到他援疾疾书《明报》上万篇时评,感受到他的勤奋好学,他的尊师重教;感悟到他的爱国爱乡情结,他的侠之大者的情怀。如今,这里成了走进金庸、了解金庸的极好载体,成了金庸读者、研究者以及金庸迷的精神家园、朝圣之地。

唯一遗憾的是,金庸自1948年离开家乡去香港,日后成名后荣归故里,却再也没踏进过赫山房。先生仙逝,英名永存,其15部小说已成为中国文学经典之作、中国文化的瑰宝。金庸是从海宁走向世界的,他是海宁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华人的骄傲。

金庸故居书香

凌鼎年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办 天津日报

1989年12月底的一天,天津民俗博物馆举办“李鹤年暨弟子书法篆刻展”。开幕式后,主办方邀请来宾在张仙阁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和王学仲先生应邀参加。记得王先生那天头戴一顶稳重深色的皮帽,我们两人先后发言。此后,我与王先生便建立了联系。

王学仲(1925—2013),笔名夜泊,晚号龟翁,山东滕州人,当代著名书画家、诗人、作家、书法理论家。1945年毕业于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后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曾师从吴镜汀学习山水画,受过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等书画大家的指导。1953年起任教于天津大学,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现代书画学会名誉会长、北京炎黄书画院副院长,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学仲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画,精于书法,创立了“龟学派”。他的诗文书画乃至散文、小说创作,都有着强烈的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但求与人迥别,不求与人雷同,只求“独一个”,这是其个性和艺术追求使然。看王学仲的画,山水、人物、花鸟笔墨淋漓挥洒,且吸收西画的色调变化,并汲取敦煌壁画、马王堆彩漆画、汉画像等艺术形式的长

津门名家谈艺录(五)

王学仲:求我时尚 写我怀抱

章用秀

处,达情性、蕴义理,真正画出了“自我”。他的书法笔意畅达潇洒,结体随心所欲,气势贯通,不拘琐细,有“淋漓大写情方快”之感,同样也写出了“自我”。

王学仲是一位有理论建树的艺术家。他对“现代文人画”“现代书法”的倡导和拓展,他所创立的“书画四象说”“立体空象观”“意象统一观”“碑、帖、经三派说”“美术思潮东移说”等艺术观,均体现出他的精湛思考和大胆追求。他综合了经、史、儒、佛、道,以及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运用其渊博的学识贯通古今来研究书法、绘画和文学,将文艺研究向深层拓展。以书法而言,其石刻考论、书法史论、古书学论、现代书论、日本书论、中国书论、书法综论,无不新颖深邃,不仅给人以新鲜感,也会给人以启迪。

王学仲著有《王学仲书法论集》《书法举要》《中国画学谱》《龟庵集》等多部艺术论著,提到古书家论、现代书论、日本书论、中日书论以及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关

系等,标明他的创作和治学理念。他提出“欧风汉骨,东学西行”的观点,融中西艺术,主张“扬我国风,励我民魂”,力求体现民族传统和气质。同时又要“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在艺术创作中注入自我的个性和情感,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符号,为现代文人画开辟了新的路径。在充分发挥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善于吸收西洋画的色调变化。

其《王学仲书法论集》自序中说:“我历年的书法理论创作,自认是面向于开展的,虽然这样,我也很尊重别人对书法道路的选择。1993年的五四青年节,我突发头风,左肢偏枯,养病于蜗居,得有闲暇,遂把发表过的旧作理为一集,公之于世。”王先生在《书法举要:中国书法的基础理论与技法》中,对真、草、篆、隶各种书体的技法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总结了一系列的规律,同时结合一些古代玄妙艰深的书法理论,用浅显的文字阐明。其《中国书画谱:中国书画的基础理论与技法》重点整理了中国山水画的各各种画法、衣纹的十八描、苔点和夹叶、各家画树法,按中国画的逻辑体系阐明了中国画所涉及的画理和技法;同时,将有关中国画的各家名言和专用术语对照相应的国画作品,用浅显的语言加以讲解。这些著述无不贯穿了王学仲先生深邃的美学思想,也渗透了他“求我时尚,写我怀抱”、注入自我个性和情感的艺术创作理念。

沽上丛话

2002年,我因工作需要从秦皇岛调入天津,很快在天津火车站后广场片区买了一套砖混结构的新房。似乎一眨眼的工夫,二十多年就过去了,自己也成为古稀老人。在市中心的养老房子住久了,逐渐感到不适应。人老最先从腿上体现出来,腿脚越来越沉,特别是手里拎着东西上五楼时,愈发感到吃力。孩子说,把旧砖楼卖了,换一个新楼房。可是市中心出行、购物、就医都很方便,街坊邻居都很熟了,有点舍不得搬家。老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以前,壮年的自己是“大腿”,孩子是“胳膊”;现在反过来了,孩子成“大腿”,老人成“胳膊”了。人老了就得听孩子的。孩子说你必须得换房。我点头说,你说了算,房本给你,你就办吧。

旧房卖出去了,买新房势必同步进行,新家选在海河河边上,孩子家在河西海河边上,父子隔河相望,每天可以自由地瞻望海河景观。海河河滩有多宽?据资料显示,海河干流河道宽76至280米,两岸堤距100至350米。最窄处在古文化街戏楼对面的亲水平台段,只有70米左右;最宽处位于海河东嘴岛和海河交叉口,将近480米。我们爷儿俩的河道间距也就一百多米。住在河东的我,过桥去河西的孩子家,只当每天步行锻炼了,岂不快哉!

家住海河边

周纪鸿



我小的时候就常来天津,我的三伯、六叔、七叔都住在这里。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来津住在三伯家,他家在老龙头火车站附近铁路货场旁的旧式楼房里,卫生间在楼下,第一次使用带有冲水设备的卫生间,给我吓了一跳。那时候秦皇岛海关一带都是旱厕,我没见过冲水设备。在三伯家卫生间解完手站起来,一拉线绳,哗啦啦水就喷出来了,我急忙跑出来,生怕被水淋湿。如今想起来真是有点少见多怪了。每次从天津回秦皇岛时,三伯就给我带上一些饺子、麻花等好吃的东西。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在天津这地方生活,该有多幸福啊。

如今我住新楼房的南边,横过一条马路,就是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的正门。在家里读书写作累了,就搭电梯下楼,往南走几步就到了二宫。这

里不仅是开会、演出的场所,更是河东风民强身健体的体育场和休闲娱乐的聚集地。塑胶跑道和绿草坪上锻炼的人们,篮球场、排球馆、网球场里运动得大汗淋漓的健儿,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动力。

但在我看来,二宫最吸引我的是图书馆。这儿的图书馆不算很大,藏书却不少。多年来,看看书报已成为我的习惯。看手机当然更方便,但是劳累眼睛也是常有的事。人至古稀,身体貌似健康,零件却磨损得厉害,使用了70年的眼睛经常会感到疲劳。走进图书馆,人就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在阅读书籍或报刊,眼睛一接触到纸质文本,似乎就舒服多了。文字在眼前跳跃,书刊独有的味道扑鼻而来。坐在阅览室里,翻阅各类报刊书籍,想起古人的遗训,“闲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然,我现在的读书行为,完全没有这些功利目的,而是一种自我选择。面对如海浪般奔腾的巨量信息,选择读书读报刊,就好比“良禽择木而栖,志士择城而居”。看小桥,眼睛酸了,就放下书报,到二宫的树林、小桥、芦苇、花圃和草坪旁随意转转。

在二宫公园里盘桓,空气清新,眼前绿意盎然,大脑和神经立刻轻松了起来。儿童在玩耍,

老人在散步或打太极拳,有人在跳健身舞,还有人对着手机在直播……看着海河两岸的人们轻松、惬意的生活,我也很高兴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几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活成了小时候的自己所期望的样子。

从二宫缓步回到家中,忽想起1975年自己曾在渤海大楼旁的中国照相馆照过一张相片,背景就是渤海大楼。翻出相片来看,当时我刚满22岁,身着中山装,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现在看来有点傻憨,有点可笑。跨下脚步又走到阳台上,环顾四周,大天津在一天天长“高”,当年的渤海大楼几乎被千幢高楼大厦所“淹没”,显现不出个儿高了。

俱往矣。静坐在茶桌前,沏了一杯明前茶,立时茶汤翠绿,茶香四溢,啜饮品茗,满口余香,满屋飘起了自在的气息,窗外,明媚的阳光洒在海河上……

满庭芳

第五二五七期